

## ※「戴璉璋教授的學術研究」專輯※

# 戴璉璋先生的《易》學研究

楊祖漢\*

### 一、前言

戴老師有關《易》學的著作有《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1988年）、《玄智、玄理與文化發展》（2002年）、《周易經傳疏解》（2021年）。可見戴老師大概從五十歲左右就對《周易》發生濃厚的興趣，越後面越用心於此。他幾本專著都與《易》學有關，希望通過《易經》義理的分析，建構一套實踐的智慧學；也可以說，是希望把《易》學的智慧活化，使華人社會接上傳統中國文化的慧命，運用在具體現實的生活中。我對《易》學沒有專門研究，只是常有機會聽到戴老師在這方面的心得，知道他的用心所在。希望藉這次的報告，表達一下我有關的了解，著重說明戴老師有關《易》學義理、哲學方面的貢獻。關於《易》經、傳的文字訓解，如卦爻辭難解的文句，他在書中有很明白而確定的說明，雖然常是以語譯的方面表達，其實當中含藏了很深的功力，有嚴格的訓詁考證的工夫。戴老師是語法專家，對於古文的語句、辭氣有深刻的掌握。他曾受學於屈萬里、許世瑛二位先生，對於中國典籍的閱讀與理解有深厚的造詣。雖然在《周易》的研究方面，戴老師參考了前輩學人的成果（如屈萬里、高亨對《易經》的考證與解讀），但都經過戴老師的深思考察後，提出明確的解釋。因此，對於戴老師書中關於《周易》文字的詮解與翻譯，我們不能等閒視之，以為是坊間一般的今注今譯。戴老師在這方面很有貢獻，最近看到羅聖堡先生的一篇論文，對此寫得很清楚，我就不重複了<sup>1</sup>。

---

\* 楊祖漢，國立中央大學榮譽教授、東吳大學劉光義中國哲學講座教授。

<sup>1</sup> 羅聖堡先生的主要論點，由張惠敏同學幫忙整理撮要如下：其一，戴璉璋老師的《周易經傳疏解》雖源自屈萬里的影響，但並非無條件地全部接受，而是有所選擇。其二，戴老師《易》例方

## 二、《周易》的起源與成書

對於《易》卦的起源問題，戴老師十分肯定張政烺先生關於《易》卦起源的說法，即古人占筮的活動，通過對著草的計算程序，產生了一些數字，排列成卦，從中得到啟發，來預測吉凶。這些數字從一到九都有，後來簡化為奇偶的兩種符號，以「一」代表奇數的數字，而為陽爻；而偶數的數字以「∧」作代表，「∧」是六的古文，後來演變為𠃉，再演變為「--」，而為陰爻。此說表示《易》卦的陽爻與陰爻都與數字有關，由數字卦逐漸演變為陰、陽爻構成的符號系統。對這種演變的說明很合理，也解釋了何以陽爻念作「九」，而陰爻念作「六」之故。這種對《易》卦根源的說明，比起民國初年因為佛洛伊德心理學的流行，許多學者用男女性器官的崇拜來說明陰爻、陽爻，合理得多<sup>2</sup>。

對於《周易》的成書，以往有歷經三代四聖的說法。戴老師認為，不能把《易經》與《易傳》的作者確定為某些個人，應該是古人（以周人為主）在占筮的活動累積中，逐漸形成卦象的符號，從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又形成卦辭與爻辭，經過孔子的論《易》，而形成《易傳》（十翼）。在此過程中，周初的王公大臣如周公、召公等，有鑑於殷取代夏、周取代殷，從這些歷史教訓中體會到在人間建立王朝，固然是得天命，但天之授命，需要以有德為條件。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故天命

---

面的說法，看似接受高亨的講法，但是其背後的《易》學見解，偏向屈萬里論《周易》為創作，而非纂輯的講法。其三，戴老師的《周易經傳疏解》吸收屈萬里繼承清儒通假、虛詞及異文研究的解釋。通假部分，如舉〈需卦〉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與〈小畜卦〉六四「血去惕出」中的「血」字，與古籍中「血」、「洫」、「恤」三字相通。在虛詞的部分，如〈革卦〉九三「革言三就，有孚」，戴老師據《讀易三種》的訓詁，不將「革」視為「改革」義，而是「用皮革捆綁，繞三圈，顯示誠信」的意思，認為這較能合理地解釋爻辭為何以「有孚」作結的原因。其四，高亨注《易》，每卦先例卦形、卦名、卦辭來通讀全書。戴老師接受高亨增補的觀念，以卦辭皆有卦名，為《周易》通例。同時在改經的部分，如〈復卦〉初九底本作「無祇悔」，將「祇」改為「祇」，為戴老師處理經傳異文的方式。見羅聖堡：〈戴璉璋先生的《易》學觀及其詮釋特點——以屈萬里先生說為參照〉（中研院文哲所主辦「2022年經學工作坊」，2022年3月29日），頁3、11-14、16-17。

<sup>2</sup> 張政烺：《張政烺論易叢稿》（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57。高亨則認為古人以「一」為陽，是象徵天；以「--」為陰，是象徵地。《易·繫辭傳》也有「天一地二」之說，此說也有道理。但張政烺的說法有遺留的數字卦為證，對於陰陽爻讀為六與九，提出合理的說明。這應該是戴老師肯定張政烺說法的緣故。

靡常，並非一旦得到，就不會改變。得政權的君王不能以為天命一定在我。於是卜筮者從對天命做一往的祈求，轉而以反身修德作為維持天命的條件。當政者必須心存憂患，敬德愛民。如同徐復觀先生所說，周初以「憂患意識」為特徵的人文精神之躍動，這是殷周之際的變革的重點。戴老師非常強調《周易》卦爻辭中所含的人必須反身修德，才能免於因為失德而造成的禍患，這一由人自身所產生的禍患的憂慮感。因此，此所謂「憂患」，並非重在擔心外來的禍患，而是擔心「自己是否成為禍患的引致者」，於是就使得以《易》的占筮來追求天命的眷顧，轉為自覺的踐德，保民而王。而對於以求問吉凶，希望得到神諭指導的心情，也轉而為在面對種種不同的情況，要求自己加以因應，即不是被動地聽從神明的啟示，而是自覺地以自己認為合理的做法來回應。這確是人文精神的表現，道德的自覺性、自主性逐步發展。在這種重德精神的發展下，逐步肯定人的自由自決，而並非一往以追求從神明而來的啟示。故《周易》的卦爻辭「是在傳統信仰活動中提示讀者對己、對人、對事、對物的適切作為，重點不在告知吉、凶，是在或吉、或凶的情境如何擅自因應。這一方面涉及個人本身的修為，另一方面則涉及對於事物發展的認知」<sup>3</sup>。戴先生在這裏明白表示，《周易》的卦爻辭不同於殷周的卜辭，已經相當程度地表現了人文的精神。

### 三、由《易經》到《易傳》

《易經》發展到孔子，更有重大的突破，這突破使《易》的占卜涵義與孔子儒學的義理得到融合，使兩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而這種敘述與說明，我認為是戴老師對《易》學的重要貢獻。戴老師很重視《帛書周易·要》篇中的記載，認為很符合從《易》古經進至《易傳》的發展理路。本來孔子的教訓並不重視通過占筮來預知吉凶，而以反身修德，為仁由己，凸顯自覺的道德主體為重點；反求諸己乃是君子之德的本質。故孔門弟子對於孔子老而好《易》，覺得奇怪，因為這不符合孔子平時的教訓。子貢（貢）於是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孔子回答：「我觀其德義耳也。」即孔子是要從卦爻符號、象數，理解人該有的德及處事之義，並非老年因為自覺、奮發的精神衰退而喜歡求神問卜。孔子表示他對於《易》的占筮的看法與喜

<sup>3</sup> 戴璉璋：《周易經傳疏解》（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21年），頁300。

好與一般史巫是「同涂而殊歸」<sup>4</sup>。戴老師認為，孔子這種老而好《易》的態度與對《周易》明德義的體會，是《周易》與儒學發展的重要關節。此處需要引用戴老師的原文來說明：

所謂《易》學，本以占筮為主，占筮的目的在探問吉凶禍福，這與儒家反求諸己的成德之教不合。孔子雖然「五十以學《易》」，但他只是藉卦爻辭發揮義理，孔門師生及孟子的言談紀錄中，都沒有涉及占筮。荀子則有「善為《易》者不占」的說法。《易傳》作者在這樣的儒學傳統中面對《易》書，自然不會沉迷筮法；他們注意的焦點是《易》學傳統中由筮法與人文精神相結合而形成的卦爻象位與義理。<sup>5</sup>

戴老師這裏對占筮與孔門義理為不同型態的學問，做了明白的區分，又認為這二者通過孔子的晚而好《易》而得到結合；這一方面使《易》學融入儒學義理，而境界層次得到上提，儒學義理也因為占筮的卦爻象位<sup>6</sup>的加入，有更豐富的發展。

戴老師續云：

象位，是《易傳》作者解說卦爻的依據；也是他們申論義理的憑藉。就象與象位來說，位其實也可以說是一種廣義的象，所以象位更具根源性。在《易傳》，可以見到論象不論位的篇章，如〈文言〉、〈繫辭〉兩傳都只論卦象而不論卦位；《易傳》中卻沒有論位不論象的篇章。就象來說，最具根源性的是八卦的自然物象，這是來自傳統的說法。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分別象徵乾、坤、震、巽、坎、離、艮、兌。這種卦象觀念加強了卦爻與自然界的聯繫，也為《易傳》作者提供了發展卦爻德性象徵的基礎。於是剛柔、健順、動入、險麗、止說，以及陰陽、大小等等相繼衍生。這些觀念，豐富了卦爻的意涵，也拓展了《易傳》作者的思想領域。他們憑藉這些觀念來探索宇宙，體會人生，就把《易》學與儒學會通融合起來。於是乾、

<sup>4</sup> 見《帛書周易·要》。在今本《周易·繫辭傳》有「天下同歸而殊途」之語，與帛書〈要〉篇的「同涂而殊歸」正好相反，在〈要〉孔子表達了他雖然喜歡《周易》，與巫祝的做法相同，但目的不一樣，因此是「殊歸」；而「天下同歸而殊途」是認為一切都在天道流行下，個別表現雖然不一樣，但最後都得以實現其價值。〈要〉與〈繫辭傳〉的意思不同。

<sup>5</sup> 戴璉璋：《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臺北：文津出版社，1989年），頁229。

<sup>6</sup> 這即所謂象數。「象」是指卦象、爻象；「數」是陰陽、奇偶之數；「位」是指爻位，以爻的位置表明事物的關係（參考高亨說）。

坤不只是〈乾卦〉與〈坤卦〉，它們還是萬物資之而始、資之而生的乾元、坤元。剛柔、陰陽不只是卦爻的性質，它們還是事物各種相對性情況的象徵，包括動靜、寒暑、往來、屈伸、闔闢等等。此外它們還是人類品德的標誌，代表健動與順成、創生與含容，以及仁與智。卦爻的對偶性，塑造了從對偶關係、感應關係探索事物生化原理的天道觀；也印證了仁智之德相生相成的心性觀。卦爻的變動性，提示了「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豐象）的宇宙觀；也加強了見幾而作、適時變通的人生觀。卦爻的象徵性，啟發天地法象無非教也的道德觀；也培育了觀象制器、開物成務的文化觀。<sup>7</sup>

戴老師此處從《周易》的卦象、爻象，陰陽之數與爻位的序列，做出種種的引申、聯想，這的確是表達了從《易經》到《易傳》的發展，也表示了儒學義理與《易》學的融合。象位與八卦的象徵，從自然的存在引申發揮為種種德性的象徵，使《易經》的卦象與儒學會通融合，既表達了天地之道的兩大根源性的力量（乾、坤），又表達事物種種的相對、相輔相成的情況，從卦象的對偶、感應的關係，關連到人事物的種種變動。因此《易經》發展到《易傳》，就成為占筮的結構、符號系統與儒家德性思想的融合，使得兩個型態的思想融成為內容豐富、系統架構清楚的自然哲學與人生哲學。我覺得戴老師這一說法很清楚而中肯，很能說明《易》學與儒學發展的軌跡，清楚說明了孔子之後，《周易》作為儒學重要典籍的內容特色。

戴師續云：

《易傳》義理的建立，當然是以《易》學與儒學兩方面的深邃學養為基礎的。《易傳》作者，如果沒有來自儒學的道德實踐、人事磨練，就不可能在卦爻中有深刻的哲思、高明的審識；另一方面，他們如果不精通於《易》學的卦爻知識、象位觀念，也不可能在儒學中有新境的開拓、形上的創見。《易傳》作者，成功地會通了《易》學與儒學，他們用儒學的義理充實了《易》學的內涵；用《易》學的卦爻開拓了儒學的思路。他們的成就，使古代占筮用書超越了迷信的巫術層次，提升到理性的道德層次、哲學層次；也使儒家以往存而不論或語焉不詳的天道思想獲致一套有效的表達形式。他們的成就，對《易》學與儒學的發展都起了決定性的影響。就《易》學來說，他們把討論的重點從占筮轉移到象位與義理。從此以後，象位與義理就成

<sup>7</sup> 戴璉璋：《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頁 229。



為《易》學研究的主要課題。人們在《易》書中所要探究的，不再是際遇的吉凶禍福，而是在吉凶禍福中如何自處；如何得其中道，守其中位，成其志行；如何與相關的事物感應而彼此相輔相成。就儒學來說，《易傳》作者把討論的興趣從心性論引導到天道論。從此以後，天道論就成為儒學研究的主要課題，人們在儒學中所要探究的，不只是如何面對自我、面對社會，而且還要追問如何面對自然、面對宇宙。於是性命與天道的關聯、人與萬物的關聯、生命的終極意義、宇宙的終極歸趨，凡此等等都成為儒者所關懷的問題。《易傳》使《易》學的研究轉向，於是《易》書成為儒家的經典；《易傳》也使儒學的領域擴大，孔孟思想所蘊含的道德形上學因而得到圓滿的完成。<sup>8</sup>

此段承上文的意思而做了開展，從《易經》到《易傳》，使《易》從占筮之書得到提升，「從占筮轉移到象位與義理」，成為人在面對人倫事物，乃至於天地萬物種種可能的情況中，根據本身對倫常實踐的體會，而反思如何回應從《易》的象數而來的啟發指點。如此的根據對德性的深入了解，而做出的回應，就使得占筮的《易》學內容得到德性精神的加入，提升層次，不只是為了考慮現實的吉凶禍福而用心，而是思考在種種人事物的情況變化中，如何有恰當的、合於德義的回應。這些回應因為有卦爻象數系統的指引，而有聯想、引申發揮等，如同《詩經》所說的比、興的作用，可以使德性的精神在卦象符號的結構下，得到與所接觸的對象感通的效果。而這些卦爻象數，也可以讓人掌握對於人生各種可能的情況的回應之道的基本型態。於是通過了這些卦象系統，也可以使儒者本來就很深切掌握的對倫常關係的處置因應之道，藉著卦象符號的幫助，使德性的意義與原則有一套可以通達落實在具體生活中的指引。

當然這些指引需要個人有清明的心思，才能得到啟發與聯想，並非如了解經驗的對象般的客觀而實在。因此戴老師認為，《易》學所培養的是人的智慧，而不是一般的經驗知識。對於經驗知識在道德實踐上的需要，戴老師也十分肯定，此意可見他在討論「格物致知」的文章中。但在論《易》學時，通過對《易經》卦象的觀察與人事的精察，是以培養實踐的智慧為主。《易經》的卦象符號本身涉及天地自然，逐步發展為對自然生化的理解。八卦本身就是種種自然存在的象徵，而這

<sup>8</sup> 同前註，頁 230-231。

些卦象又成為儒家德性之學從人生而關涉到大自然，從個人的反身修德而體悟到天地生化的本體，於是認為天人合一，三才同道。通過這種發展與融合，決定了後來《易》學重視象位與義理的內容特色及發展方向。戴老師認為，儒家思想能夠發展為道德的形上學，融入《易經》的卦象是重要的關鍵。通過易道的陰陽乾坤，乃至於天、地、山、澤、風、雷、水、火等等相對相偶的相互變化，人在觀察這些相偶變化的現象時，就引發了對天道不測的神用、生生不已之妙有一具體的了解，於是從形而下而達於形而上，從用而掌握到體。戴老師這一表達，即通過《易經》的象數使儒學從重人事實踐，而通於自然，以至天道，開闊了儒學的視野與精神境界，說明了義理的轉折的關鍵。這是對儒學的流變，乃至於中國哲學史的發展十分重要的說法。

#### 四、《易傳》之道德的形上學

儒家的形上學或從道德實踐體會天道，在孟子、《中庸》本來就有，但《易傳》的理論型態，因占筮系統的作用，而非常有特色，與老、莊的天道論也有不同的義理型態。對此戴老師有以下的說明：

關於天道，與《易傳》先後同時的作品如《禮記》裏的《中庸》、《禮運》、《樂記》、《大戴禮記》的〈本命〉、以及道家的《老子》、《莊子》都有所論述。在天道的形式意義上，即作為形上的實有而是萬物生成的終極根源這一意義上，各家是相同的。但在天道的內容意義上，由於體證途徑的歧異，《易傳》與其他各家就有顯著的不同。《老》、《莊》的天道，是由人的無為、萬物的自適而印證，是在「有」與「無」的相反相成中彰顯其大用。這與儒家的天道當然不能混為一談。《易傳》與上述大小戴《禮記》各篇的天道，是由人的德性、萬物的生生而印證；但只有《易傳》在道的體用方面有詳盡的論述。它是從事物的對偶性因素相互感應這裏來說明天道的大用。這對偶性因素當然不是《老》、《莊》的「有」與「無」，它是乾坤、剛柔、健順、動靜等等，而在〈繫辭傳〉作者心目中，這一切又都可以用「陰」與「陽」來概括。<sup>9</sup>

<sup>9</sup> 同前註，頁 231-232。

此處戴老師認為，《易經》卦象所含的相對相偶、相反相成的組織結構，對於體會天道的生化、人事的實踐，是有重要的作用，有特別的闡發，這也可說是戴老師對《易》學的重要見解。他認為由《易傳》這樣卦象的對偶變化（如：泰卦與否卦，剝卦與復卦，既濟與未濟），而體會天地、人事的變化多端、生生不已，就可以體會到道不離開陰陽變化，但又不同於陰陽而為生化之神。

戴老師此說，我認為可說是表達了《周易》特別的「觀法」，這也是戴老師對《易》學的重要看法：

所以他說：

一陰一陽之謂道。（〈繫辭上傳〉第五章）

這一陰一陽，描述了事物的對偶感應、盈虛消息、生生不已，這就是道的大用，易道就在這一陰一陽中呈現，萬物的體性也在這一陰一陽中呈現，人的仁智德性也是這樣一陰一陽地呈現。所以說：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

在先秦儒家典籍中，能這樣體用兼顧而又道器貫通地論述天道的，只有《易傳》。<sup>10</sup>

此處戴老師對「一陰一陽之謂道」的意思做出了「體用兼顧」、「道器貫通」的解釋，這是很恰當的，也清楚表達了《易傳》藉陰陽消息的變化來說以道德為本質的天道本體的作用。由此，如果要討論《易傳》的道德形上學，除了要了解天道生生不已、宇宙生化，也就是道德的創造外，也要配合《易經》本身的卦象的結構，從其中的對偶性與感通性，相反而又相成，來體會易道的生生不已。易道就在可見的陰陽生化與人事的變化中表現，可謂是即用而見體。這種對《易經》卦象與象數的觀察而體會到的意義，可說是《易傳》觀天地自然的「觀法」（類比佛教所言觀因緣生起，而有析法空、體法空等觀法）。由於有這一觀法，就可以使人對於天道的生生有一上達之途，即從具體可見的現象，通過卦爻象位的觀察而自然上達。

在《周易經傳疏解》的〈緒論〉中，戴老師對此義有更明確的發揮：

這一段意謂人們習《易》，觀玩卦爻象、辭，體會其對偶感應的「一陰一陽」之道，然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乃可以據以仰觀天文，俯察地

<sup>10</sup> 同前註，頁 232。



理，能體會幽明消長的緣故；推究開始的狀況，歸結終點的情形，能體會到死生交替的義蘊；著眼於適當元素聚集成物，其所散布的作用流動生變，能體會聚散盈虛的情狀。這樣窮理，可以印證《易》書「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的說法；同時也會拓寬人們的視域，開顯仁智心性，成就人文化成的德業。<sup>11</sup>

這一段論說周詳而明白，所謂的「觀玩卦爻象」，「觀」可以說是觀法；「玩」則表示對於《周易》卦爻與象數的變化，有一種由深觀而來的體悟。說是玩，含美感的觀照，也是理智的遊戲之意。通過觀與玩，使人內心純粹、精神清明，而開拓視野，與天道生化相感相應。戴老師認為，孔門「仁且智」的教訓與人文化成的德業，與易卦的加入而形成的《易傳》的道德形上學，是非常有關係的。人的精神如果只停留在人事關係上用心，而不通於自然萬物，不能上契天心，智慧是達不到圓成之境的。

## 五、討論與結語

上文表達了戴老師對《周易》的特別了解。他的說法對於理解《易》古經的原義及《易傳》的形成，提出了很有價值的解釋，對於儒家義理在《易傳》形成之後的發展，也表達了個人的體會。在這個問題上，戴老師可謂是「成一家之言」。他對於儒家形上學的形成，通過《易》學的發展來說明，又強調了「觀易」與「玩易」的意義，相當有創意。除了上述的意思之外，還有一些意思，補充於後。

戴老師對於《易》經、傳所說的君子之德，認為「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最恰當的表達。這裏可以有內外兩層的修養，修德是清明自己的心智，而義是精察外界的情況，做出恰當的回應。「敬以直內」根據的是道德的原則，這是人反身就可以理解的，但通過卦象符號的作用，可以即象以明理，使道德原則通過卦象符號，做比較具體的展示。而對於處事之義，本來也有重視倫常關係的傳統學問來做底子，但通過卦象系統的展示，的確也會表達出新的精神或新的啟發。我想用以下各點來表達我對戴老師《易》學的一些體會：

（一）占筮本來是求神明以解疑難的活動，並不是純粹對於德性的原則做理性

<sup>11</sup> 戴璉璋：〈續論〉，《周易經傳疏解》，頁 XV。

的反省。但由於占筮必須誠敬純淨人的精神，如〈繫辭傳〉所說：「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這幾句話的原意是描寫占筮的時候所用的蓍草沒有生命，沒有思維活動，但如果以誠心來求問，這蓍草就可以對所問的任何問題做出回應或做出啟發指點。這樣通過占筮的精神狀態，而體會到人與天地之道相通，又可以通過作為占筮的《易經》的卦象而得到啟發指點，這就表達了對於易卦與《易傳》的閱讀，並不能當作外在的文獻資料或一般的道德教說來看，而需要提起精神，純淨化自己的內心，希望能與神明相契相通，這並不能以一般所謂迷信的活動來理解。提起精神而求與天地、神明相通時，的確可以有與天地、與自然萬物相感、相應的體會，這是何以《易》的經、傳從占筮而可以論到天地神明之德、三才之道之故。當人的精神提振而澄清生命、表現智慧時，便會有與天地萬物相通相感之契悟，而體會到天、地、人三才之道其實是相通的。而觀天地、陰陽往來的變化，也可以理解到天地萬物與人生都是往來變化、始終相繼而無窮無盡的。這是通過《易經》卦象的演變逐步人文化，以德義改變只為了趨吉避凶而占筮的存心，使儒家內聖外王之學，通過易道的通於神明、卦象符號的連接人生萬事，合而成為一個特別的成德之教的聖典。

（二）何以要通過卦象符號來對於人的反身修德與回應所遇，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加以智慧的培養呢？本來孔門論學，重在即事言理，而非空說理論。從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藉歷史中的人事來明白是非；《論語》論理多不離開人事，言下學而上達，踐仁才能知天，也是此意。《易》的經、傳通過符號系統來啟發指點人的修德及對遭遇的回應，也是不空言義理的傳統做法。《易》卦象從數字卦的一到九各個數，歸納為奇偶的系統，這一系統就可以引申發揮為陰陽的變化。通過對偶反覆而曲折的運用，具體指點人生的各種情況，一方面不空言理論，另一方面，卦爻的變化又對人生具體的情況，提出種種的啟發指點、引申發揮，十分奧妙。這是通過符號系統，來表達人內心理性的運用所可以產生的德行意義，以及在人倫關係的實踐上，對於人事物的種種可能情況的先見，加上符號系統的啟發指點、微妙的暗示，就使得「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不止於道德的教說或經驗的歸納，而讓人的精神凌虛觀照，有神妙莫測之感。這是說符號系統的運用，加強了德義的豐富內容。

（三）道德基於人本具的理性，有其先天的根源，而人倫關係的實踐，則是先天的德性的原則落在具體的人事上實踐。這裏有從根源的道德理性，用在具體的人

事關係，與先天的原則落實在現實經驗中的運用，而且不只是純粹的德與義的要求，而有行道盡義，因應現實上種種可能的情況，而可以有善於變通，吉無不利的效果。這裏可能不像從仁義之心做出道德的決定那樣的直接而純粹，因為仍有占筮上的趨利避害而做的要求存在。雖然如此，仍是以仁義的德性作主，認為有德者才配有幸福的結果，於是也使得《易經》的卦象系統、《易傳》的種種啟發性的言詞或申明，固然內容豐富，但也有在現實上達成合理的結果的強烈要求，使人能精察事理，造就合理的人生。這是《易經》與《易傳》的特性。

（四）戴老師對於《易傳》的道德形上學的理解，雖然受到當代新儒家的影響，但戴老師有他自出機杼之處。熊十力先生的哲學思想歸宗大易，通過其翕闢論來表達《易》卦的三畫，象徵宇宙生化的兩股力量的相反相成。這固然精彩，但對卦象系統沒有全然的鋪陳與掌握，也沒有說明卦象系統何以能夠與儒家成德之教相結合。牟宗三先生早年的《易》學著作，固然也從《易》的卦象系統說明宇宙生化過程與條理，即《周易的自然哲學與道德函義》，但此時牟先生所重的是藉懷德海的哲學，以表明《易》學的宇宙論意義，對於生化的本體之意義說得不多，也未建構完成道德的形上學。後來他在《心體與性體》與其他的論述中，則以創生性原理與終成性原理來解說乾坤，透悟宇宙的生化及道德的創造，對於道德形上學的涵義、儒家客觀面的義理充分提出說明，但也不同於戴老師內在於卦象系統，指出一條觀卦象變化而體會天道生生的下學而上達的途徑。通過以上的比較，相信可以看出戴老師《易》學的形上學之特色。

（五）至於何以人以《易》來占筮，能夠從《易》的卦爻之象，對人生的各種事情，似乎都可以做出有意義的回應，好像《易》之卦象是無事不可問似的，這一問題也需要說明。《周易》的象數通過了符號時位的變化運用，好像蘊涵了一個無限可能的人生事件之大海，一切事都可以在卦象符號中取得關聯。這除了《周易》的作者們認為人道通於天地之道，所謂「三才」，以及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卦爻象，可以象徵人生與自然一切的變化外，一切人生事物的情況，本來是有其基本的模式型態，而可以以卦象來象徵。若是如此，則對《易》卦可以應對人生任何事情的提問，就不足為奇了。二十世紀的心理學家榮格 (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 認為，《周易》卦爻所表達的內容，合於他所謂的「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人除了自我意識外，又有自我無意識及集體無意識。集體無意識如同一大海，潛藏了人類種種生活的可能（案：這似乎可以用佛教所講的阿

賴耶識來理解)，於是個人的意識內容，可以是無窮無盡的；通過《易經》卦象的啟發、聯想與暗示，可以觸發了每個人都具有的集體無意識的內容的了解。這就說明了何以通過卜筮的求問，對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出合理的回應的緣故。連同上面所說，人在面對「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蒼草的時候，就可以釐清、引發人所本具的「集體無意識」的內容，而對於眼前所關心的事情究竟如何回應，提出合理的指示。如果這樣講，用《易》來占卜，並不只是求神明給予答案，而是引發及釐清自己的本有的無限可能的思慮，思考回應之道，而做出恰當的決定。以上所說是順著戴老師對《周易》的理解而做出補充，即是就占筮時感通天地之道的可能，以及閱讀卦象的符號與文辭時，暢通及調理生命本身可能有的、本為潛藏的眾多經驗。戴老師認為，《周易》是培養智慧之書，又為實踐的智慧學，說明了《易》學既是占筮，又明德義，而且通過卦象的符號系統，讓人精察事理，由「敬以直內」到「義以方外」，最後通過這些修德與精察的訓練，通於天地之德、宇宙的生化。戴老師的這些講法非常純淨而合理，表明了《周易》的獨特性，以及雖然不能脫離占筮以趨吉避凶為目的，而又是成德之教的寶典的緣故。必須綜合以上各點，才能了解《周易》的大義，而明白《周易》的種種內容與特色。戴老師對於馬一浮先生所說的「終於《易》」十分贊成，認為人文教化需要以《周易》為終。成德之教必須使自己內心清明、純粹，而又能行所當行，而且這種「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的實踐，可以讓人時時感受到天、地、人的相通，人與自然之為一體，而且也可以靈活地回應遭遇的種種情況，而吉無不利。從這些實踐中，人就可以與天道相感通，這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終成。而「終」是「完成」之義，這是人道的完成，也是天、地、人三才之道具體在人中完成，而且終而始，始而終，沒有斷滅。故《易》之為終教，是完成而又是生化的再開啟，即〈繫辭傳〉所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如果只說生死，即生之後一定是死，則宇宙終歸於空無、存在者即終於不存在。而《周易》從原始反終來知生死之說，便是只有完成而不是終了。